

辽宁教育出版社



章炳麟 著

章太炎的白话文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章炳麟 著

章太炎的白话文



新世纪
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太炎的白话文/章炳麟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6512-0

I. 章… II. 章… III. 章太炎 (1869~1936) —文集 IV. B25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145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数	6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5.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本书说明

《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书前有吴齐仁（张静庐）的《编者短言》一篇，书中收《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常识与教育》、《经的大意》、《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概》和《中国文字略说》七篇白话演讲录。

这是一本曾经引起学界争议，特别是被章太炎大弟子钱玄同指为“伪书”的书，也是一本章太炎本人根本不看重，从未收入《章氏丛书》和续编，差一点被人遗忘的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国学大师。这部《章太炎的白话文》收录的是章太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的汇编，最初陆续发表于一九一〇年三月至六月东京《教育今语杂志》第一至第四期，均署名“独角”。^①

《教育今语杂志》是光复会的机关刊物。该刊《缘起》明确昭示：光复会同人对当时“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深表忧虑，“爰设一报，颜曰《教育今语杂志》，明正道，辟邪辞，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所陈诸义，均由浅入深”。《章程》更进一步交代该刊“以保存国故，

① 其中《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发表时题为《庚戌会衍说录》，列入“代社说”栏；《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常识与教育》两文发表时无题，均列入“社说”栏，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后的标题疑为张静庐所加。

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依上列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故名《教育今语杂志》”。

这份《教育今语杂志》为宣传种族革命思想,保存国故菁华,普及平民教育,以“今语”(大白话)出之,是理所当然的。章太炎作为革命党领袖人物,自应支持《教育今语杂志》,他同意《教育今语杂志》接连刊登他在东京的白话演讲整理稿,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样做对他是降尊纡贵,是对他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一种让步,这也就是这些演讲稿发表时未署真名,后来又只字不提的原因。

到了一九二一年,以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的文学革命已风起云涌,后来成为上海新文学出版名家的张静庐初出茅庐,就为泰东图书局编印了这部别致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既迎合了时代潮流,又以事实证明章太炎早在一九一七年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之前就做过白话文,而且是“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做白话文的模范”。此书在一年之内连印三版,也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可惜张静庐这个精明的策划尽管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难免百密一疏。疏漏就在于书中误收了钱玄同的《中国文字略说》一文。二年之后,钱玄同本人首先在《答顾颉刚先生》中加以“揭露”。十八年之后,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又判定此书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从此以讹传讹,此书竟长期错误的划归钱玄同名下。其是非曲直,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刘思源的《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①。

但是,《章太炎的白话文》在海峡彼岸却引起过相当的重视。一九二二年六月,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印了此书,《重印前言》照录如下:

《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于民国十年,所辑论文七篇(自

^① 载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一至七)皆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报》被禁后,先生闲处东京时对留学生讲学之纪录。第八篇为光绪三十二年初抵东京时,在神田区锦辉馆欢迎会上之演讲辞,乃此次重印所新增。六十年前章先生对于“留学”、“教育”、“中国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见解;今方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之际,先哲说论,尤堪重视。

此小册原为丁文渊先生所有,在德国留学时赠与关德懋先生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关先生归国,书物留存客舍。战后奉命使德,重访故居,独此小册安然无恙;睹物思人,颇欲流传以资纪念。案此书国内藏书目录未见,所收讲学七篇既不见于《章氏丛书》,亦未见《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倘非丁先生携去海外,历劫幸存,重归故国,或将佚失无闻。今日读上,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巨。爰特为之重印,以贡献于学术界,兼为丁先生作纪念焉。

这段印书因缘,真是令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艺文版《章太炎的白话文》增收了泰东版失收的《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对《中国文字略说》,因不知真实作者,也未予删除。

在章太炎艰深繁富的学术论著中,《章太炎的白话文》自然无法占据重要地位。但此书别具一格,“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巨”。因此,列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予以校勘重印。重印本以泰东版为底本,为存历史原貌,《中国文字略说》仍予保留(此文毕竟也体现了老师章太炎的文字学思想),但注明系“钱玄同撰”;同时,附录原载一九一〇年六月《教育今语杂志》第四期,而为泰东版失收的《论文字的通借》和台湾艺文版增收的《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两文,使此书成为一部更为完备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章太炎对至今人们仍在关注的教育、留

学、中国文字和文化典籍等问题发表了很多精到而有趣的见解,希望此书的重印能成为莘莘学子借助章太炎这位国学大师去进一步了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道津梁。

陈子善

2001年4月20日于上海

编者短言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书，往往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

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一月。

【目录】

本书说明

编者短言 (吴齐仁)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1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10

常识与教育 /21

经的大意 /30

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37

论诸子的大概 /50

中国文字略说(钱玄同撰)/54

附录

论文字的通借 /62

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 /67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最怕别人要问：什么缘故？现在诸君在这边留学，是什么缘故？又问回家去教育子弟，是什么缘故？大概总说求学是要使自己成有用之材，教育是要他人成有用之材；这句话，原是老生常谈。但看起来，有几分不对；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以见得呢？你看别国的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个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他专讲究政治学。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靠书籍上得来的少。就像中国现在，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又向实业一边看来，日本农科大学的学问，颇还好了，也该有几分行到民间，但民间农业仍旧不好；论到日本田边一看，秋收以后，桩子还在，并不知道收后要耕一次。直到来年下种，方才去耕。所以每年收获，不过同中国山东一样。中国江苏、浙江、江西的农人，两只黄耳朵，并没有听人说过什么农学，收获倒比日本加倍。固然几分靠着地质，到底是农人勤耕美粪的力居多。可见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那里有专靠帮助的！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中国古代的学问，都趋重致用一边；因为当时的人，只有看外边的眼光，没有看里边的眼光。觉得学了无用，不如不学。但到战国时候，已经渐渐打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自己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比为世界求实用的心，要强几倍。就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了。况且致用的学问，未

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还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机会。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专求智慧，只要靠自己，并不靠什么机会。假如致用不成，回去著书立说，那件致用的方法，又是各时各代不同。近几代有用的，将来又变成没用，这书也就废了。不是枉废精神么？至于专求智慧，见得几分真理，将来总不能泯没。就有一点儿漏洞，总不会全局都翻。这书倒还可以传到后来。照这两样看起来，讲学问的，又何苦专向致用一路呢！在政府设许多学校，原只望成就几个致用的人，至于学生求学，以及教人求学，就不该专向致用一面。大概诸君心里，自己都晓得有自己，也晓得他人都有自己，未必是专向外边去追逐的。

还有人说：求学是为修养道德，教人是为使人修养道德。兄弟看起来，德育、智育、体育，这三句话，原应该是并重。不过学校里边的教育，到底与道德不相干。兄弟这句话，并不是像教士的话，说道德都在礼拜堂里。但道德是从感情发生，不从思想发生。学校里边，只有开人思想的路，没有开人感情的路。且看农工商贩，有道德的尽多，可见道德是由社会熏染来，不从说话讲解来。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再高了，讲到伦理学，这不过是研究道德的根源，总是在思想上，与感情全不相关。怎么能够发生道德出来！况且讲伦理，讲修身的教习，自己也没有什么道德；上堂厚了面皮，讲几句大话，退堂还是吃酒，狎妓。本来他为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虚应故事，去讲几句。俗语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就是伦理学教师的职分！说话与感情本没相干；自己的道德，又不能为学生做表仪，要想学生相观而善，不是“煮沙成饭”么！不单是这样说，先生就果然有道德，也未必能成就学生，何以见得呢？中国的孔夫子，道德就不算极高，总比近来讲伦理学的博士要高一点；教出来的学生，德行科也只有四个，其余像宰我

就想短丧，冉有就帮季氏聚敛，公伯寮还要害自己同学的人，有什么道德！郑康成的道德，能够感化黄巾，倒是及门的郗虑，害了孔融，又害了伏后，始终不能受郑康成的感化。后来几位理学先生，像二程的道德，也算可以了；教出来的学生，有一个邢恕，和蔡京、章惇一党，名字列在《宋史·奸臣传》里。孔子、郑康成、二程，道德是本来高明的，所设的又是学会，不是学校。先生学生的亲切，总不像学校里头，见面日久，还不识学生的姓名，尚且有一般学生，反背道德的，何况入广大无边的学校？从空口大话的教习？于道德有什么益处！兄弟看来，大凡一处地方，人聚得越多，道德就越腐败；像军营、寺院，都是一样，寺院里边的人，满口高谈道德，还有许多戒律约束他，道德尚且不好；军营里边，有极严厉的军法，逼得军人一步不得自由，也不过勉强把面子糊了去；学校里边，规则本来较宽，实在也不能用严厉的法子硬去逼束，空空的聚了许多人，道德自然难得好的。就有几个好的，或者天资本来醇厚，或者是从他的家教得来，或者所交的朋友，都还是品行端方，所以不很走作，并不是学校能够养成他的道德。但一切讲教育的人，总要把德育的话敷衍门面，不过因为道德是人间必不可少的东西，若开口说我这个学校里不讲道德，面子有点儿过不去，所以只好撑这个虚架子。究竟学校里面所讲的，在智育一面多，在德育一面少。就有几句修身伦理的话，只像唱戏，先要天官出场，到底看戏，并不要看天官。跳天官的也不是有名脚色。学生听讲的，并不要听伦理修身的话；讲伦理修身的，也不见得是有道德的人。诸君不要说兄弟的话太刻薄，只要自己问一问自己的心，再上向看一看那个教习，一定要说兄弟的话是先得我心了。如果揭开帘子，说几句亮话，只要说学校本来是为智育，并不是为德育，道德果然不可缺乏，却并不是学校的教育所能成就。诸君果然道德完具，也不能在学校里头，把道德送给他人。以后从事学校

的教育，可以拿定主意，向智育一方去，不必再装门面，向德育一方去。

照以上的话，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是最大的坦途了。既然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但凡不晓得那边实际，随风逐潮，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中国十几年前，相信欧洲的学问，没有路去求，求着教士，就觉得教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听得福建严几道的话，渐渐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又觉得严几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有游学日本的风气，渐渐把迷信严几道的心又破了。又觉得日本的博士、学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及到日本了，晓得分科，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看日本全体的学者，依然觉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一边的迷信又起么？欧洲所有各科的学问，日本人学了一科，到底能否登峰造极？没有欧洲的学者来对质，总不能破。就有欧洲的学者要来对质，不识得日本字，也难得破。至于中国的各种学问，日本的深浅，兄弟已经略略看得明白了。现在不必揭他人的短处，只说诸君回去施教，若信了日本的语，就要防学生的伏兵，且看中国历史一项，一部《纲鉴易知录》，向来中国略读书的人，是看得最浅陋的，但到这边来听的历史，一部《支那通史》，翻来覆去，缭绕了许多，比《易知录》更加浅陋。学校以外，就有几个讲历史的人，只记得一点儿事迹，许多正史的书志，早已抛在九霄云外，并不是专忘记细碎，连大端也实在不讲。万一学生看过《资治通鉴》，或者又看过几卷志，问出一句话来，先生不晓得，恐怕只好说：“你在《图画集成》、《册府元龟》里头翻来的僻事，那里能够记得许多！”过了一会，学生就拿这部原书，折了一只角，放在先生案上，岂不是遇着伏兵，没有处躲闪么？中国的地理，本来有许多沿革，有一位什么博士，把湖北杨惺吾做的《沿革图》钞去，改头换面，变为自己的著

作,称为《支那疆域沿革图》,已经好笑了;还有那边画的中国地图,一省里头,胪列了许多府,却是缺了一两府。一府里头胪列了许多县,却是缺了一两县。所缺的府县,并不是于形势上无关紧要;所列的府县,又不是于形势上最关紧要。不过那边画图的人,精神错乱,偶然忘了,万一学生来问,某省的某府,某府的某县,现在在什么方位?古来叫什么名字?请问怎么样答对呢!只好说:“恐怕没有这一府,这一县,是你随口编造。”那个时候,学生取出中国自造的地图来对质,不是又遇了伏兵,到辙乱旗靡的地位么?中国的哲学,近的是宋明理学,远的是周末九流,近来那边人也略略把周末九流随口讲讲;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说是这样说,到底掩饰不过去。那位博士,不知不觉把《史记》里头“士为知己死”一句话,引做《论语》的话了。若是相信了这位博士的话,回去施教,学生随便举一句古书,问先生在那一部书?先生就不免对错。到后来学生取出《史记》、《论语》来对校,说这句话,果在《史记》上,并不在《论语》上。我想先生只好说日本的古本《论语》,还在《汉石经》、《唐石经》以前有这句话,岂不是又遇着一路伏兵,把先生的脚都陷了下去么?中国的文法,本来句句顺的,那边的文法,是颠倒的居多;所以那边几个大儒,做了几百年的汉文,文理总不很通。宋朝以后的文章,还勉强看得下去,唐朝以前的文章,就看不下去。他自己说:只求义不求文,倒也罢了!却有一个什么学士,自出心裁,做了一册《汉文典》,硬用那边的文法,来强派中国的文法,有一大半不通。本来中国

有一部《马氏文通》，做得颇好，近来有人说马氏的书旧了，倒是这位学士的好。唉！真是好笑。别的有新旧，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旧么？中国沿海的人，已经迷信了，只望内地的人和日本留学生纠正几分，假如不能纠正，反用了那学士的书做文法参考书，自己的文章，也必定变做不通，何况去教学生？万一学生看了先生的文章，在墙背后指天画地的笑，先生怎么能够自己解说？恐怕只好说：“现在的新文法，要不通才算通。”岂不是又遇了一路伏兵，使先生进退无门么？唉！真是苦！学生的伏兵很多，先生的军备很少！在中国做先生，不像日本做先生的容易；一边是学生程度已经整齐，一边是学生程度还没有整齐。入京师大学的，或者只有入得小学校的程度；入小学中学的，或者也有入得大学校高等学校的程度。先生的知识，要百倍于教科书，十倍于学生，方才支持得下，（为什么比教科书要高百倍？比学生只要高十倍呢？因为学生的知识，颇有在教科书之上的。）不然，就一生要吃苦了！（这句话，也并不专为应对学生起见，其实自己本来应该要有这种知识。）问这个苦是谁给你吃的？也怪不得日本教习，只怪自己迷信。兄弟近来有几句话，使许多人解一解迷信，什么话呢？说日本人学欧洲的学问，第一是从欧洲人那边直接受来的，第二是懂得语言文字以后，再去研究的，第三是分科学习，不混在一起的，所以破绽还少。对着中国学问就不然，一向是不从中国学者亲受，也不学中国语言文字，也不知分科去求，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梦，至今没有醒悟。还有许多自己不懂，向横滨、长崎的商人去问（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还有几个江湖游客，捏造许多古事古迹来，有意诳骗他们。以前是这边骗那边人，现在那边受了这边人的骗，又转来骗这边人。假如诸君见着几个商人游客，想来总不把学问的话去请教他。现在转了一个小弯，倒不知不觉入其玄中，自己想想，好笑不好笑？得了这一声笑，迷信自然瓦解冰消了。